

发展中的收入分配：U型假设

李中伟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课题，特别是70年代以后，有关收入分配的理论文献占据了发展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对于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观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研究发展中的分配问题，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实际发展趋势，都面临着收入分配到底是改善还是恶化的根本问题。从这一角度看，U型假设的提出及检验具有十分重大意义。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讨论U型假设问题。

一、U型假设的提出

所谓U型假设是指：在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收入分配在其早期阶段迅速恶化，接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大致不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得到改善。简单地说，U型假设把收入分配的变动按其先后序列分为三个阶段：恶化、不变和改善。

U型发展的假设推理，首先是由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在1954年12月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第67次年会上提出来的。在他的主席演讲中，库兹涅茨说：“人们可以这样假设收入结构中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趋势：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即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文明迅速转变的时期，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将扩大；接着是短暂的稳定；而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分配中的不平等则将缩小。”^①由于这个原因，U型假设也常称为库兹涅茨假设或库兹涅茨定理。

分析一下库兹涅茨假设的背景与思路有助于进一步了解U型假设的含义。在那篇著名的演讲中，库兹涅茨首先问道：在一个国

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是扩大还是缩小呢？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水平与趋势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库兹涅茨根据英美等国的资料回答说，一般的结论是，收入的相对分配在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特别是20年代以后，例如，在美国最低40%的收入份额从1929年的13.5%上升到40年代的18%，而最高20%的收入份额则在相应时期从55%降到44%。在英国，最高5%的收入份额从1880年的46%降到1910年的43%，再持续降到1947年的24%。而对第二个问题的探讨则表明，收入分配本身的自然倾向似乎应该朝着更加集中的方向发展。原因有二个。其一，高收入阶层通常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例如，美国最高5%的人口集团约占个人储蓄总额的三分之二，而最高10%的人口集团则几乎占有个人储蓄的全部数额。因此，“若其他条件不变，储蓄不平等的累积效应将导致有收益资产在上层集团内更大比例的集中，从而导致该集团及其后代更大的收入份额。”^②其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非农业化的过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农村的人均收入通常都小于城市，并且城市的收入不平等比农村更加严重。因此，在转变过程中，整个的收入分配将更趋恶化。如果将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农业A和非农业B，并设定初始的分配类型，那么，在部门B的人均收入高于部门A的假设条件下，农业部门人口比例的逐步降低将导致收入份额的愈加集中。

显然，库兹涅茨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

问题的回答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之处在于,从经济过程本身看,收入不平等应该更趋恶化,但从实际统计数据来看,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则在改善。正是这种矛盾导致库兹涅茨推测,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早期,存在着分配不平等扩大的阶段。至于分配状况的改善,库兹涅茨归之于现实经济中不断增长的抵销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民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干预。库兹涅茨总结说:“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来证明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趋势,也不可能指明各阶段的精确年代。但是,我宁愿把1780年到1850年看作是英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早期阶段;1840年特别是1870年到1890年为美国的早期阶段,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为德国的早期阶段。”至于改善阶段,“在美国和德国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英国则要更早一点,约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代。”^③

从以上库兹涅茨关于U型假设的提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概括起来说,库兹涅茨认为,富人比穷人更大比例的资产积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导致的非农业部门收入份额的提高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将使收入的相对分配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迅速恶化;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时,民主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和法律的干预会抵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从而使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第二,库兹涅茨假设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重复同样的过程还有待于检验,至于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必要走同样的道路更有待于讨论。

第三,库兹涅茨关于分配不平等长期趋势的论断的确是一种假设。一方面它缺乏早期的统计数据;另一方面,它在推理上也相当粗糙,这特别表现在库兹涅茨对AB部门转换的论述中。

第四,库兹涅茨关于分配的长期变化是

指收入的相对变化,即是指上层集团人均收入的提高快于或者慢于下层集团的人均收入的变化,并不是什么绝对量的变化。另外,在衡量恶化或者改善方面,该假设更多的是注重上层集团所占份额的变动。

二、U型假设与分配理论

U型假设虽然是一个分配类型的经验假设,但它直接涉及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相互关系。因此,凡是有关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都可看作是对U型假设的注释。

关于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将不断恶化的观点,我们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大卫·李嘉图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李嘉图把社会分为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劳动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们分别是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劳动的自然价格或长期工资决定于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或实际工资则取决于劳动的供求变动。由于资本积累的速度赶不上工人人数增长的速度,并且货币工资的增加慢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在长期发展中有下降的趋势。至于利润和地租的变化则取决于剩余价值在二者之间的分配。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并且谷物价格得不到控制,那么经济增长将导致利润率下降地租的上升,并最终导致经济处于长期静止状况,因为,一定的利润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李嘉图深受马尔萨斯的影响,把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归咎于劳动人口自身的过度增长,显然是荒谬的。

新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分配不断改善假设的支持。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社会产品并不是任何一个生产要素单独创造的,而是各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上,产品的分配决定于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各生产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化则取决于要素的相对数

量、要素的替代弹性以及需求的类型等等。当然,不同性质的技术变化、节约资本、节约劳动或是节约土地的,对各收入份额的变化亦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一般而言,经济的增长、资本的深化意味着劳动相对稀缺性的增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工资率具有逐步递增的趋势。

以上是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在分配问题上的基本论点。就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而言,在古典学派那儿,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对新古典来说,分配的改善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当然,对于古典或新古典学派的分配论点存在着广泛的批判,这里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古典学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库兹涅茨所断言的U型发展的恶化阶段,19世纪上半叶或更早一点;而新古典学派则处于U型假设的改善阶段,在英国为19世纪的最后几个时代。

U型假设虽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但它却直接关系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研究。在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内,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由刘易斯所倡导并由费一拉尼斯所发展的劳动剩余模式。

和李嘉图一样,刘易斯把收入分配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他首先问到,什么使利润份额得到提高呢?为此,刘易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提出了劳动剩余的发展模式。在该模式里,国民经济被分为两大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远高于农业部门。因此,两部门的工资差异导致人口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使利润份额不断提高以及现代工业部门远快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都将使收入分配愈加恶化。而当剩余劳动吸收完之后则回到新古典状态,劳动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一般认为,劳动剩余的

发展模式是典型的U型曲线。

不过,上述的一般推论还是有疑问的。因为,即使农业部门的产量不变,从而相对全国总量而言其比重下降,其收入份额下降;但在此过程中,人口的相对数量也发生了变动,即农业部门产量比重下降的同时,其人口比重也在下降,结果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应是提高而不是下降。收入分配的状况如何呢?在劳动剩余模式的假定下,最贫穷的农业工人的收入份额虽然慢于利润份额的提高,但却好于不变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工资。可见,分配状况到底是改善还是恶化取决于收入不平等的衡量。如果注重最上层份额的变化,则是恶化;如果注重最下层份额的变化反而是改善。

除了典型的劳动剩余模式外,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论点。里德(M·W·Reder)指出,未开发社会的集中程度受到总产量接近维持总人口的最低生存水平的限制,几乎没有过多的剩余来满足特殊集团收入份额的扩大。因此,低收入国在其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将趋于恶化。克拉维斯(I·G·Kravis)则从劳动差异的角度强调了分配的恶化。克拉维斯认为,在前工业化社会里,劳动几乎是同质的。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行业和职业间的劳动差异越来越大,从而使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状况恶化。一些论点特别强调了外部力量的责任。T·米德(T·Mende)指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前者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剥削后者的性质,从而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分配。以拉美为代表的依附论认为,哪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最大,哪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就最集中。著名学者巴兰(P·Baran)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双重剥削。另外,跨国公司的作用也是人们普遍评及的目标。

所有以上论点都忽视了收入分配平等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特别提到缪尔达尔(G·Myrdal)。缪尔达尔以一贯强调制度研究而在发展经济学中独树一帜。在缪尔达尔看来,不发达国家内部资源和权势的极大不平等是它们不发达的部分原因,而提高穷人消费水平的平等化的制度改革,从而提高人们的生产力,是更迅速发展的条件。缪尔达尔说到: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群众遭受营养、住房和其他方面严重消费不足之苦。因此,更高的消费水平是更快和更稳定增长的条件。^④提高穷人的消费水平会导致总需求中必需品比重的增加,奢侈品份额的减少。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有助于经济增长,只要存在着以下条件,即奢侈品进口倾向的变动;必需品需求扩大所导致的规模经济;通过劳动集约来生产必需品所导致的资本节约。

三 U型假设的检验及意义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分配的变化持有不同的观点。那么,收入分配的实际过程怎样呢?这就是所谓U型假设的检验问题。

理想的检验方式需要充分的时间序列数据,即能检验一国在其发展中各收入份额的相继变化,正如库兹涅茨在其主席演讲中所做的那样。之后,库兹涅茨又在《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VIII、收入分配》一文中,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变化过程作了更详尽的数量说明。不过,基本问题仍然存在。首先,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变化是否适应于发展中国家呢?其次,即使就发达国家而言,也不能充分证明其恶化阶段的存在。由于这些原因,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交叉比较,即从纵向比较转向横向比较。如果在所选取的国家中,分配状况在较低和较高收入国或集团内要好于中等收入国,那么,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就具有U型关系。

1973年,阿德尔曼(I·Adelman)和莫里斯(C·T·Morris)首先运用44个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回归出明显的U型轨迹,具有极大的影响。不过,阿努瓦里亚(M·Abeuwalia)三年之后的研究成果,包含了更多的内容。阿努瓦里亚根据60个国家的样本得出结论说:“交叉回归分析提供了充分的测量手段来支持收入不平等长期变动中的U型假设。”^⑤具体地说,回归分析表明:第一,除最高的20%的人口集团以外,所有其他10%的收入份额都经历着随人均GNP提高,先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过程。而最高20%的收入份额则经历相反的过程。第二,收入变动的转折点各不相同。就整个样本而言,最高20%人口收入份额的下降点为364美元,中间40%的收入份额的改善点为291美元,而最低20%的转折点为600美元。

很显然,交叉回归分析混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根本不同,也掩盖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看来,在缺乏足够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U型发展还只能以假设的形式存在。

其实,马克思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过科学的论断。他指出:“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⑥换句话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这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和一般的规律。尽管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研究U型假设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 U型假设的研究唤起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分配问题重新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人们曾普遍认为: “在有什么东西可以分配之前, 关注再分配问题是毫无意义的。”然而, 这过去几十年里, 发展中国家虽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 但增长给贫穷家庭所带来的收益极其有限。以印度为例。从1950年到1982年, 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从913.6亿卢比增长到14, 514.1亿卢比, 前后增加15倍多, 即使按不变价格计算也增加3倍多, 但收入分配却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最富有的20%的人口集团的收入份额50年为55%, 63年52%, 76年仍达49.4%, 最贫穷的20%的收入份额在六十年代为5%, 七十年代也仅有7%。正因为如此, 阿德尔曼在《论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一文中, 把发展经济学的动荡归咎于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忽视。他说: 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都未达到理想的目标, 经济学家们终于认识到, 所谓工业化或GNP的增长必然导致穷人收入水平的改善的神话, 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 U型假设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收入分配相对恶化的变动机制, 哪些是经济过程本身所必然产生的, 哪些则不是。一般来说,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收入分配的相对变化至少与以下三组基本因素有关。第一是所谓部门间的移动, 它包括人口的移动及各部门所占总产量份额的变动。这里, 重要的是部门发展与人口流动的相互关系。如果部门差异或地区差异的扩大快于人口的相应变动, 那么整个分配就有恶化的倾向。在简单化的两部门经济中, 这一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第二是劳动差异的变动。引起劳动差异的原因有很多, 但通常把它和教育的普及程度相联系。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 初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有助于减少劳动差异, 提高低收入集团的收入份额。第三是人口增长的影响。人口增长率对分配的影响既取决

于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互关系, 又要看不同收入集团在人口增长方面的差异。显然, 人口增长的越快, 特别是低收入集团的人口增长, 那么, 收入分配的状况就越难改善, 甚至会更坏。当然, 收入分配的变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这要求我们研究更多的相关因素。

最后, U型假设的研究可以为政策选择提供基础。在调整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 一国可供选择的战略大致可分为三类: 先增长然后再分配、先再分配然后增长、增长与再分配并行。相应的政策手段包括: 强制或非强制地进行资产一次性再分配, 剥夺、征收和赎买; 通过税收政策对上层收入和财产进行连续性的再分配, 累进的收入税、财产税和与奢侈品相关的间接税; 通过财政政策对下层集团进行连续性再分配, 基本消费品的财政补贴、农业扶助方案和教育发展计划等等; 与分配相关的一般经济政策, 最低工资率、劳动密集型的投资导向等等。为了有效地选择战略重点, 我们必须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 即要研究在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素中, 哪些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哪些则是其结果, 哪些甚至阻碍了经济发展。只有弄清楚了不同因素的作用, 才能运用正确的政策手段。不适当的政策手段要么加重了不平等状况, 要么会阻碍经济自身发展。南朝鲜、台湾等国以土地改革为先导的较为平等的发展政策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的; 相反, 拉美等国过于偏重现代工业的发展政策, 从而导致不平等扩大的教训更令人深思。

①②③西蒙·库兹涅茨: 《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 载《美国经济评论》, 1955年3月号, 第7—20页。

④参见谭崇台等译《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第155页,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年, 北京。

⑤《不平等, 贫穷和发展》, 载《发展经济学杂志》, 1976年12月号, 第30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责任编辑 沈晓冰)